~~本书~~
全民阅读,无处不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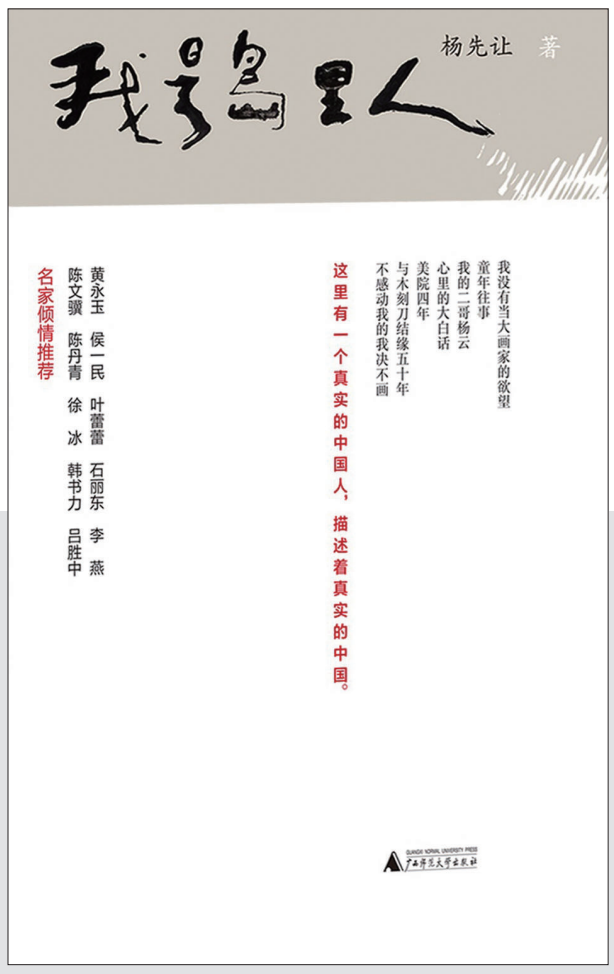
不感动我的我决不画

尾尾 摘编

杨先让,凡争名占位他先让,凡弘扬艺术当仁不让。曾赴美十余载,到处讲学,既不谈当代神话,也不捧“当代艺术”。只讲他熟悉的祖国、亲切的师友。

——李燕

《杨先让文集——我是岛里人、三人行、梦底波涛》
杨先让/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11月



1,

1976 年,“文革”终于结束了。在周恩来总理逝世一周年将要来临之际,大家都站出来情不自禁地要做些什么,以表达对总理的深切怀念。

一天,范曾跑到我家,兴冲冲地说出了一个计划:他要写一首思念周总理的歌词,请作曲家吕远谱曲,由歌唱家郭兰英在纪念周总理逝世一周年的演唱会上演唱,同时由我赶制一幅纪念周总理的木刻版画,由《人民日报》在周年纪念刊上发表。时间不到半个月,但大家却一致赞成这个计划,各自去完成任务。在当时压抑的政治形势下,这种艺术创作是顶着很大的政治风险与压力而行的。

那时,周总理的形象资料实在不多,我费尽辛苦终于在旧《人民画报》上找到一张我认为最理想的形象,那是周总理与陈毅访问六国时的集体照片。虽然周总理的面部形象只有拇指盖大小,但对我来说足够了,因为周总理的形象在大家心里都很熟悉。我每日放大镜不离手,从在纸上起稿,直到上梨木板绘稿,再动手刻制,整个创作过程我都处于激情之中,十分顺利。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创作从技法上来说是非常冒险的。我先刻了周围的景色和总理的身体,最难的面部刻画放到了最后。但由于通宵工作,精力高度集中,刻到面部形象时,已进入了相当疲劳的状态,如有一刀失误就前功尽弃。当最后一刀结束时,我知道一切终于如愿以偿了。

所谓“如愿”是指这幅作品恰当地运用了木刻专业技法,特别是版画所要求的黑白处理以及刀法的运用。技法运用的目的就是准确地表现总理内在的精神气质,这是最重要的。

在这幅画中,我的刀法是根据画面的不同需求而不断变化的。云与山水不同,树与花草不同,衣服与搭在胳膊上的外衣明暗刀法处理不同,尤其是面部绝不是单纯地刻素描,而是要根据细微起伏的肌肉表情,顺着肌理精细地刻画。刀法不能死板单调,要有轻重粗细走向不同的变化,刀法的运用既要微妙,又要干净准确,不能有一点废刀。做到以刀代笔不易,一刀下去错了不能补救,尤其刻肖像,刻错了只能将板子全部刨了,再重新反画稿子重刻(我在教学中绝不教补木板,我自己也从来没有补过板子)。我在刻总理的面部时,要不时地在镜子里反照,既要形象准确,又要刀法贯通,的确很不易。

当时一共印了多少张并没有记录。送朋友、亲戚,还有人为领导人讨要,我乐此不疲。邓颖超大姐得到一张,见到画就哭着说:“作者一刀刀刻的,怎么谢他呢?”最后邓大姐让人转送我几份有关总理的简报和图书。叶剑英、邓小平、郭沫若、林业部长罗玉川等人,都得到了这幅作品的原作。我也没有料到,只是由于情之所至,这幅画突破了规矩。

2,

1977 年,贺龙的女儿贺捷生找到我说:“你给我爸爸刻幅木刻画吧。”我说:“我不了解他呀。”她说:“我告诉你,他死得太可怜,连病带酷刑而且是饿死的,一个将军死后连遗体都找不到了。”

贺捷生后来给了我一些贺龙事迹的文字材料,并一次次流着泪向我讲述他父亲的事迹。

慢慢地我进入到贺龙所生活的历史空间。我了解了他年轻时被逼上“梁山”的原因,他家庭的故事以及他姐姐活动在洪湖地区的英勇传说。

新中国成立后,贺龙给人们的印象是生动活泼的,留着小胡子,叼着烟斗,哈哈笑着,用他的爱心护佑着新中国体育队伍的成长。那是中央首长群体中不可少的一员大将。

我开始了构思,构草图,选择他一生中最适合表现的情节,也是日夜赶制,因为要赶贺龙的纪念日,时间又很紧张。

我抓住贺龙一贯的雄姿,选择他在洪湖边建队伍的年代,强调天空密云翻滚,远处放射着的曙光照耀着湖面……

终于赶在了贺龙纪念日前完成。那天当我在广播新闻中听到了报道我的作品发表于《人民日报》的消息时,心里真的欣慰。我用刻刀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

鲁迅在厦大平民学校对那些穷家孩子们说的话令人感动不已:“你们贫穷的只是金钱,聪明与智慧你们并不缺乏。”在《鲁迅在“厦大” 讲话》这幅画面中,我强化了木刻的黑白效果,让窗外的阳光照射在孩子们的身上,一群朴实天真的孩子认真静听着一位导师的殷切教诲。

木刻版画一定要强调刀刻出来的效果,刀刻与笔画的质感是完全不同的,木刻版画的风格是其他绘画技法所不能代替的。

我刻过的自己喜欢的名人肖像,有冼星海、鲁迅、周恩来等,还刻了一位外国人——白求恩。长期以来,我对从加拿大来中国援助抗日战争的白求恩大夫崇敬有加,在我的作品中缺少了白求恩那将是一个遗憾。

我开始琢磨如何表现他的形象,是他为战士医治时的工作情景,还是别的什么情节。经过反复构图,最后决定用套一色的方式刻画他的正面肖像,背景是雄伟的太行山,他行走在山间崎岖的小路上,牲口驮着他的医疗器材。

此画完成后,心中感到一种释放,总算为自己所喜欢的人刻了一件作品。

3,

我住的北京北牌坊胡同的房子要拆迁,搬到临时工棚去住。只要是自己的窝儿,就有一番温馨。我刻了一幅《小宅》以示留恋,也是用麻胶版刻的,正好以粗线为主刻了出来。

几十年来,骑自行车到位于帅府园的学校上班,总要穿过煤渣胡同,天长日久,胡同两旁的景色已变得平常而淡漠。秋天的一日,我向路口的青年教会望去,一抹夕阳照在院内金黄色的白果树上,在那中西合璧的建筑衬托下显得分外的耀眼夺目。我不由自主地下了车,靠在一边观赏起来,红色的大门,墙内一棵被霜打红了叶子的梨树。白墙、金黄色的白果树,简直就是一幅画。我赶快从提包中找了一个笔记本草草地勾了几笔,路过的同事问我做什么,我笑了笑。这个画面在脑子里转了好几天,终于设计分色,刻出了几套版,一幅表现北京秋天的木刻版画诞生了,来得如此容易。我从1944年夏来到北平,经历了几十年的春暖寒冬,对北京秋天的魅力深有体会。这幅画可以说是够得上典型的北京金秋。可惜由于当时工作太忙,只印了几张,采用水印、油印相结合的方法。

接着我刻了另一幅油印套色木刻《院里院外》。我常去郊区门头沟斜河涧山村写生,春天的梨花,秋天的柿子给我的印象极深,我不止一次地画了刻了。那年全国美展,版画组也在征稿,我将此画包好,请系里的秘书送去,结果画落选了。我也懒得再送一幅去或者交涉一下,以我的身份来说是可以的,但我感到没必要。这又一次提醒我,木刻版画全国都在转向、创新,而我深感自己无力变化。还是那个意思,我该放下刻刀,洗手不干了。何况我已经从版画系出来另创一个“民间美术系”,忙得我一塌糊涂。当时的副院长艾中信说得好,“全美院就看杨先让在跑来跑去”,真是一点不假。

评述

忘了一件大事,连部派我和先让去拉萝卜,大约来回要一天时间,回来的路上,四顾无人,我说,告诉你一件大事,你要保密!他说好。我说:这事全国全世界都知道,如果你现在先说出去,咱俩都玩儿完!他不笑了,他说什么大事有这么严重?我说:你发誓保证,我就告诉你,要不然,只当我没提起。他好奇心切:我保证,你说吧!我告诉他林彪叛逃全家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他扔下车子,靠着路边青杨树,眼看着天,三两分钟才说,你什么也没说,我什么也没听。一路上他再也没有说话,交了差,回到宿舍,他也没有说话。

——黄永玉《天未怀先让》

杨先让,凡争名占位他先让,凡弘扬艺术当仁不让。曾赴美十余载,到处讲学,既不谈当代神话,也不捧“当代艺术”。只讲他熟悉的祖国、亲切的师友。他介绍的是徐悲鸿、李苦禅……甚至还有早已被边缘化的悲鸿弟子王青芳,让彼邦人士耳目一新。啊!中国这么美,中国传统文明如此丰沛,中华文明的长河至今还如此澎湃。他现身说法的演示,图文并茂的光屏,无不在激情浪花与柔情涓涓中润入异域人民的情怀。

——李燕《我所认识的杨先让先生》

先让老师第二辈子最最得意之事,想必是他于1980年率先创办了“民间美术系”,并附年画与连环画专业。我能因此得识连环画大匠贺友直老师,便是杨先让老师请了他来,就住在学生宿舍楼下的一间房,和大家就着过道的炉子,炒菜烧饭吃。我的妻子黄素宁有幸成为年画系研究生,翌年,该系同学去敦煌考察,先让老师亲自送行,火车启动了,只听他对着车窗口的同学叫道:“去吧!你们去敦煌‘怀孕’吧!”

——陈丹青《热情的记忆:读杨先让老师文集》

书边杂识

为什么要向这个老人致敬?

——节选自《杨先让:一个人的中国百年美术史》

为什么要向这个老人致敬?

在80后还在襁褓的时候,这个老人已经在中央美院创建了“民间美术系”,把民间艺术提升到学院体系中观察、学习、创作……而这一举措在当下的中国都是不太可完成的事情。

当80后在成长,这个老人已经带队十四次走完了黄河,对黄河流域的民间艺术理出了一条新的脉络——完成了一部被黄永玉和陈丹青称为“被震傻了”的《黄河十四走》。

在90后刚刚步入这个世界,这个老人在退休后,在海外宣传中国的民间艺术。在观察对比了中西艺术后,他认为中国艺术、中国艺术家应该以我为主。

今天的年轻人,不管是80后,还是90后,可能不知道这个老人是谁,但是也许听说过他的老师:徐悲鸿、李苦禅、董希文、蒋兆和、吴作人……

也许听说过的同事和朋友:顾毓琇、周汝昌、黄永玉、侯一民、钱绍武、郭兰英、郭淑珍……

也许听说过他的学生:徐冰、陈丹青、吕胜中、陈文骥、韩书力……

这位老人就是杨先让。

如果记忆是因为遗忘,那么杨先让的伟大便是他让记忆得以再现,让时间在文字中凝固。

杨先让是徐悲鸿主持国立北平艺专后的第一届学生,那是中央美院最为星光熠熠的时光。众多的艺术大家在美院传道解惑,又有众多才华横溢的学子如饥似渴。岁月缓缓流淌,在一个甲子之后,作为后辈的我们或许已经无法感知当年中央美院的风采,在大众读物之中,也鲜有专门记录那个时代的精彩文字。历史也就这样慢慢地淡忘着属于它的最精彩的章节。也许,这是最无奈的事情。

在这套《杨先让文集》中,艺术家杨先让展示了其另一个身份:记录者。他用他艺术家的丰富情感记录下了美院及中国现代美术数十年发展中的那些人、那些事。于是,我们看到了郑锦、徐悲鸿、古元、吴作人、力群、李桦、张仃、邹雅、叶浅予、王青芳、李苦禅、黄永玉……一个又一个鲜活的艺术家出现在我们面前。

书中的这些记录都是杨先让埋藏最深的记忆,也是他内心最深处的纪念。这样的笔墨,这样的回忆,写的是中央美院的人物志,也用这仓皇时代下的悲欣交集的众多人生,勾勒出整个中国现代美术一百年的传承、发展、再传承,以及当代美术的走向。

我在读 薛家柱

湖光山色相映美

《西湖登山撷趣》
曹家桥/文
胡寒 莫图 王华/摄影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5-5
定价 39.00元

当今世界,无论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或者海内外,喜爱旅游的人谁不知道杭州西湖?谁都知道风光旖旎的西湖以山水与人文取胜。要回归大自然的怀抱,去杭州西湖旅游,徜徉在青山绿水与人文历史之中,让心灵得到最好的休闲,这是海内外游客对西湖的向往和选择。尤其西湖被联合国评为世界文化遗产以后,来杭州西湖的游客更是与日俱增。

西湖之所以对海内外游客有这么大的吸引力,除了真山真水真风景的巨大魅力之外,文学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宋,“诗人市长”白居易、苏东坡就倾情吟诗来歌咏西湖:“忆江南,最忆是杭州。”“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如此闻名,恐怕与白、苏及其他诗人的诗不无关系吧?可见文学的魅力和作用。

历代以来,有关介绍西湖的诗文和图片可谓成千上万,不计其数。导游手册更是摆满风景区游览点,但缺少图文并茂对西湖之美全面展示的书籍,成为一大遗憾。

眼前,这本《西湖登山撷趣》是作者积十余年围绕西湖群山登乐写作的小品文,不少曾发表在多种报刊上,现精心挑选结集出版。文章短小精悍,1500 字左右,配有摄影师胡寒等所摄照片,与读者分享。

曹家桥是我老友,标准杭州人,对杭州市井民俗生活非常熟悉。他是高级经济师,业余喜欢写作,几十年除在报刊发表短小散文,还有好几部长篇小说及专著出版。益民的作品,没有当今文坛流行的那种浮华、虚假、矫饰,却行云流水般在真实地写他的观察和体验,写有着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西湖与杭州市井的风土人情。每篇文章言辞真切、文笔优美,读来倍感亲切。他的文章没有固定的格式、不太守旧;率性而写,挥洒自如,犹如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湖。因为作者对西湖的美看得太久,所以能传达出西湖美的真谛。

胡寒是中华摄影家协会会员、曾多次获得国内外大奖。莫图是一个专业摄影组,王华则是新锐摄影师,他们珠联璧合,合作了这部《西湖登山撷趣》。

虽然书名叫《西湖登山撷趣》,却不光写登山,也写游湖,作者对西湖 30 多个著名景点的湖光山色、四季风情、道路景观、人文建筑、名人故居、历史掌故等的印象、感受,无不入文。因此孤陋寡闻的我,从来没见到过这样一本图文并茂的西湖山水美景图册。

美,是一种客观存在;审美,是人们的主观意识,即所谓一种文化现象。审美文化,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的客观环境,与思想、文化潮流密不可分;也与人们的自身品质、思想观念、文化素养等息息相关。而且随着社会更迭、历史变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审美文化内涵。魏晋六朝时期,审美文化的核心是儒、释、道;新中国成立后,曾一度强调阶级分析观点;改革开放以来,已与世界潮流汇合,重新回归审美的本义了。

当今的世界,到处是矗立的钢铁、水泥的森林,山野已被城市的碉堡所吞噬, 大自然受到严重污染, 美遭到人为的灾难性破坏。对自然环境、大地母亲的破坏践踏,是对美的践踏,也是人对自身人性的践踏和破坏。在一切物化了的社会,人类可能已厌倦了纸醉金迷、人欲横流的工业社会现代文明之污染。他们对美已淡忘了、审美的感觉麻木了,就想重新寻觅失落了的美好事物,找回审美的思维,希冀能有一个美好隐逸逃避滚滚红尘的精神家园。返璞归真、回归大自然,成为当今最时尚的世界性潮流。

于是,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现代化高度发达的国家,一下把目光投向东方,对东方的审美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西方人认为:东方的文化是本质意义的美,是一种“天人合一”文化,最符合宇宙的本来面目,人们要回归,就是要回归这种文化的源流、美的真谛。因此,登山、越野跑、快步走,成为当今世界时尚的潮流。因此,这本《西湖登山撷趣》正符合当今审美的情趣。

本书还被翻译成英文,并增加了一些景区介绍和古诗。